走向命运与共：
从抗战精神到全球倡议



环球时报 GLOBAL TIMES

外交学院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目　录
CONTENTS

引言 历史不容篡改，正义不容挑衅　/01

（程永华 中国前驻日本大使）

我们不仅要告诫日本，以史为鉴，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切实走好和平发展道路；还要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团结国际社会正义力量，共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我们自身也要肩负起历史使命，通过扎实的史学研究、全面的教育普及和有力的国际传播，构建和巩固起坚不可摧的历史记忆与民族精神防线，让历史真相薪火相传。

第一部分 中国抗战：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壮烈实践　/07

1、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有深层体制原因　/08

（徐　焰 军史专家）

自80年前裕仁天皇在广播中念了那个只称“终战”而不明言战败的诏书后，日本在事实上接受投降，其高层却长期不肯承认对外侵略罪行。了解战败前的日本国情的人知道，那是一个下对上要严格服从社会，军队内又等级森严，一批少壮军官怎么可能越过上级挑起举国动员的战争呢？如仔细研究当年日本“官–军–财抱合”的体制，就能戳穿那些洗白上层罪责的手法，也会就此明白其战争罪责为什么在多年内得不到彻底清算。

2、中国抗战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　/15

（林利民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

中国军民勇敢承担并完成了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历史使命，也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14年抗战厥功至伟，也让中国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者的尊敬。中国共产党人及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依靠人民、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成为“中间国家”反法西斯斗争的榜样。

3、反法西斯大同盟为什么能成功　/20

（徐　蓝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反法西斯大同盟的重要成功经验之一，就在于当人类面临共同的敌人法西斯的时候，能够摒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而结成反法西斯大同盟，并肩战斗，最终战胜了邪恶的法西斯。

第二部分 战后秩序：人类迈向共同未来的制度保障　/24

1、多边合作是战后安排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25

（沈　逸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在设计联合国的基本框架时，作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机制安排的前身，即由中、美、苏、英四大国共同承担责任的构想，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种超越传统强权政治窠臼，务实推进多边合作的努力，奠定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坚实基础。

2、日本军国主义仍未清除，绝不能姑息　/29

（刘晓明 中国前驻英国大使）

牢记历史就是不允许一些势力企图否认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企图篡改二战历史，企图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牢记历史就是敦促日本正确对待侵略历史，避免重蹈覆辙，坚

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3、挑战一中原则，就是挑战二战胜利成果　/32

（汪曙申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

当今任何国家、任何势力和任何人别有用心地炒作“台湾地位未定论”或者替民进党当局“新两国论”背书，都是蓄意歪曲台湾问题的性质，对抗国际社会一个中国的格局，挑战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新时代以来，祖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础更雄厚、能力更强大，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

4、为什么需要推进国际秩序的良性变革　/37

（朱　锋 钱靖轩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学者）

战后设计的多边合作框架正面临对抗性叙事的威胁。尤其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往往抱持“例外主义”心态，认为自己有权根据自身利益重新解释或选择性适用国际规则。当一个国家拥有压倒性的综合实力优势时，它会倾向于通过单边行动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多边协商寻求妥协。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通过纪念二战这段历史，以二战胜利的“初心”来推动国际秩序的良性变革。

第三部分 面向未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3

1、世界需要新理念、新方案　/44

（马小军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了一种与传统不同的国际关系新方案。相互尊重主权，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国家间平等相处的基础。以合作互惠为基础的双赢是中国外交政策奋斗的目标，这一理念贯穿于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主张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国际社会可以从中国的外交实践中，看到一种可行的

新选择方案。

2、以四大全球倡议应对当前国际挑战　/49

（李开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也许战后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现实地看，它仍是我们当前所能实现的相对较好的选择，也是未来更好国际秩序的基础。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和大国协调等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精髓，当前应该进一步坚持而不是放弃。同时，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并不意味着抱残守缺，如何更加有效地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和实现公正，仍然是战后国际秩序需要解决的问题。

3、从人类文明高度再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　/54

（李忠杰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在人类再一次面临对抗还是缓和、战争还是和平、侵略还是反侵略的关键时刻，只有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才能正确认识本国与他国的关系，才能以正确方式处理各种复杂的国家关系，才能真正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才能真正摒弃冷战思维和侵略手段，才能让世界免于重演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结语：捍卫战后胜利成果，共筑人类命运方舟　/59

（王　帆 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学院院长）

历史已证明，唯有同球共济，凝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才能团结应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和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人类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固守霸权旧梦，只会让世界滑向对抗的深渊；推进命运与共，方能开辟团结合作的新篇章。

引言

历史不容篡改，正义不容挑衅

中国前驻日本大使 程永华

八十年前，一场决定人类前途命运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持续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为这场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战争胜利，为实现世界和平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当今国际风云变幻之际，回顾八十年前的硝烟与战火，在正本清源的过程中铭记历史镜鉴，珍惜当下和平，展望未来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支柱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绝非一场孤立的民族自卫战，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人民就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以血肉之躯筑起了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钢铁长城。在长达十四年的浴血奋战中，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绝大部分主力。中国人民用3500多万军民伤亡的巨大民族牺牲，拖住了日本法西斯侵略铁蹄，有力支援世界各地反法西斯力量，致使日军北进战略破产，

推迟其南进步伐，为盟军在欧洲、太平洋战场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　、浴火重生的新征程。”这场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洗刷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国际地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它深刻证明，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不仅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壮丽篇章，更是对人类和平事业作出的不朽贡献。历史不容忘记，正义终将胜利。这是历史给人们昭示的真理，也是我们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

中国积极参与建立战后国际秩序

抗战的胜利，不仅仅意味着驱逐了侵略者，更重要的是，它为建立一个以联合国为核心、持久和平的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主要成员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家宣言》《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制定，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构建国际新秩序扮演了积极、重要角色。这一秩序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通过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和制度安排，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彻底改造，限制其再次军事化，确保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

《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波茨坦公告》则重申《开罗宣言》条款必须实施。这些国际法文件，明确了日本必须遵循的原则，构成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根本基石。中国始终是这一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参与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国际格局演变，为日

本历史修正主义泛滥埋下了祸根。

日本社会的整体历史认知出现危险变化

我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参与对日工作，曾见证日本社会对战争历史的反思。那时，尽管不时有右翼势力发出刺耳噪音，但日本主流社会普遍对战争罪行怀有愧疚，民众大多对军国主义保持警惕，并对中国、韩国等邻国人民抱有歉意。然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国内否认甚至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沉渣泛起，其言行屡屡挑战国际公理正义，挑衅亚洲受害国人民，正在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负面因素。

需要警惕的是，这种逆流的影响力已不局限于少数右翼政客。现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历史问题上总体承袭田中角荣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客观认识，但他今年发表战后80周年官方谈话的想法，因受到极右势力牵制而作罢。民意调查显示，日本社会整体对二战历史的认知也正变得模糊甚至扭曲。据日本共同社与日本“言论NPO”的民调，超过四成日本年轻一代对“8·15”日本战败日毫不知情；许多日本青少年很少或几乎不与家人朋友讨论二战历史，他们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主要来源于经过淡化和粉饰的学校教育和影视作品。

造成上述情况的根源，首先是美军占领改造不彻底，为历史修正主义回潮埋下伏笔。战后初期，盟军总司令部（GHQ）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以“非军事化、民主化”为目标的改革，旨在彻底铲除军国主义社会基础。然而，随着冷战阴云笼罩，美国战略重心发生转移。美国对日政策从最初的“改造”迅速转向“扶持”，导致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清算戛然而止。甲级战犯嫌犯岸信介等人，非但未被彻底整肃，反而被释放并再次登上日本政治舞台，担任首相要职。这种“放虎归山”的行为，为

日本清算历史问题带来巨大障碍。

其次是战争记忆风化，为历史修正主义提供了生长的温床。右翼势力试图从根源上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的“皇国史观”日渐侵蚀历史教育领域。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高中历史教科书时篡改史实，把涉及侵略的表述改为“进出”或“进入”，把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改为“全面进攻”，淡化甚至篡改南京大屠杀等侵略史实。当时日本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中国、朝鲜和韩国等亚洲国家予以强烈谴责。在周边国家的压力下，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谈话承诺纠正教科书记述，并在审定标准中新增条款，提出处理涉邻国历史内容时需考虑“国际理解与合作”。此后周边国家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同日方进行了长期斗争，但在反复拉锯中日本篡改、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仍不时出现，导致日本年轻一代对本国二战罪行缺乏足够认识，使错误史观在日本国内蔓延，为军国主义残余思想提供土壤。

许多日本政客和媒体片面强调日本战争“受害者”身份，尤其是在广岛、长崎被核爆问题上，他们以“唯一遭受核打击的国家”自居，大肆渲染自身悲情，却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只字不提或轻描淡写。这种无视历史因果的论调，混淆了加害方与受害方的根本区别，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供奉有14名对侵略战争负有严重历史罪责的甲级战犯，部分日本政要将其视为“追悼英灵”之地并屡次参拜，是对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公然挑战，严重伤害亚洲受害国人民感情。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正逐步在政策层面发挥影响，推动挑战二战后建立的和平框架。近年来日本国内修宪动向日益抬头，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正常化”，大幅增

加国防预算，突破“专守防卫”，推进军事松绑。近来，日本政坛上甚至出现一股主张排外倾向的势力。这些动向的背后始终存在一股力量，急于摆脱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军事力量的限制，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

另一方面，在当前大变局下，美国为了在战略上拉拢日本，服务新冷战布局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对日本的利用也愈发明显。美日勾连动向日益具体化、军事化，也同样体现在二战历史叙事层面。例如，今年3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出席硫磺岛战死者悼念仪式时，将二战中美日双方士兵的“勇敢精神”相提并论，称其将“永载史册”。不久前美国国务院竟称“美国和日本结束了太平洋地区一场毁灭性的战争”。这种公然玩弄“岁月史书”的荒唐言论，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公理的粗暴践踏，为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背书，也是试图在亚太地区制造阵营对抗，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弘扬正确史观，共促和平发展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重大原则问题，关乎两国关系重建的政治基础和两国人民感情。这些年来，中日双边关系在经贸、文化、人员往来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格局。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也成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基石。这一切，都离不开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秉持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在1972年邦交正常化时就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作出的明确约定。

当前，国际形势面临深刻变革，中日关系也再次面临改善发展的十字路口。历史的警钟长鸣，告诉我们和平底线必须坚守，历史悲剧不能重演。我们不能放任历史修正主义的逆流，挑衅中国和亚洲受害国人民，践踏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更不能坐视这股思潮勾结域

内外的地缘政治算计，颠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将地区重新推向阵营对抗和军事冲突的深渊。

我们不仅要告诫日本，唯有正视那段侵略历史，才能真正汲取教训，以史为鉴，必须以诚实态度严格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精神，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切实走好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还要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团结国际社会正义力量，共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坚决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抵制任何试图挑战历史、颠覆正义的言行。更重要的是，我们自身要肩负起历史使命，通过扎实的史学研究、全面的教育普及和有力的国际传播，构建和巩固起坚不可摧的历史记忆与民族精神防线，让历史真相薪火相传。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为戒。传承历史，不是为了纠结过去，而是要开创未来，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捍卫历史真相、坚守国际公平正义，是实现本地区乃至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也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事业发挥重要积极作用。

第一部分

中国抗战：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壮烈实践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有深层体制原因

徐 焰

自80年前裕仁天皇在广播中念了那份只称“终战”而不明言战败的诏书后，日本在事实上接受投降，但其高层长期以来大多不愿承认对外侵略罪行，首脑讲话往往只称战时政策发生“错误”而鲜少公开道歉。日本国内舆论又屡屡渲染战前少壮军人“下克上”冒犯高层，例如描绘“二二六”兵变的不少影视作品都突出了下级官兵对重臣行凶时刀枪齐下的血腥场面，这虽然是自曝家丑，却也就此把罪责向下转移，日本官方所编历史书籍也常声称一线军官在外“擅自”行动突破了当时政府“不扩大”的方针。

不过，了解战败之前日本国情的人却都知道，那是一个下对上要严格服从的社会，军队内又等级森严，一批少壮军官怎么可能越过上级挑起举国动员的对外侵略战争呢？如果仔细研究当年日本“官—军—财抱合”的体制，就能戳穿那些试图洗白上层罪责的手法，也会明白为什么那些人的战争罪责多年来得不到彻底清算。

武士只是凶残打手，高官和财阀才是侵略主谋

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日本军人的凶残让世界惊骇，细究根源，一定程度上在于西方“优胜劣汰”的帝国主义法西斯观念与日本国内武士传统的畸形结合。古代日本列岛长期面临大名或军阀割据，他们培植出社会上的专职武士阶层，并造就其为上拼死效命和对下无情杀戮的“羊狼兼备”性格。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社会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武士阶层名义上被取消，其众多成员变成职业军人。日本旧军队特别是陆军保留着诸多派别，

上下级中又保留了主奴式封建传统，一些少壮军官在派系争斗中往往会听命于“主子”，充当对异己斗狠的打手。

1868年正式开始明治维新后，天皇由宗教领袖变为日本最高的实权主宰，过去各藩分立的军阀武装统一成“皇军”。日本当时一些规模不大的工商业主，把握时机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大财团，并充当军政势力的支柱。明治初年形成的财力最强财阀之一的三井财团，就为建立“皇军”贡献了大批资金。日本发动所谓“日清战争”（中国称甲午战争）时，年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当时汇率是1日元约合中国一块银元），是各财团牵头在全国筹集了2.5亿日元，才保证日本发展军工业并打赢那场战争。这场掠夺之战从中国得到的赔款和缴获品共计2.9亿两白银，折合3.6亿日元，日本政府随即用战争获利酬谢三井等大财团，这又刺激了官、财、军三界的扩张野心并形成“以战致富”的侵略国策。

甲午战后日本继续不断对外侵略，上层分工是“官”决策、“财”保障、“军”出手。不过，三方“抱合”时也常出现分歧。他们的扩张思想虽然一致，但计较收益的财阀因害怕赔本而相对谨慎，迷信“武士道”的军官中却充斥着狂热的“愣头青”。因为后果难料，政客、财团和老派军官在开战时往往讲“缓进”并在幕后观望，少壮军人却以“决死”态度出面挑事，若不成功则要充当“替罪羊”来承担责任。

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曾被日本描画成关东军几个参谋的“擅自行动”。但其实，那就是一场前后台配合演出的欺人把戏。当时日本面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经济总量下降1/3，上层便想通过侵略中国东北来振兴经济，“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在其国内成为一时的口头禅。不过，官方和

财团担心美英会采取经济制裁，军部高层也有顾虑，便授意关东军的二流军官充当“出头鸟”。在沈阳下令开火的是三个佐级参谋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先装作不知情，交战后见东北军未抵抗才下令全军行动。关东军占领沈阳、长春等要地时，日本政府向国际上宣布“实行不扩大方针”，军队却迅速实施全面占领。见美英没有制止，日本高层便批准建立“伪满洲国”，并对土肥原、板垣等人加官进爵。这哪里是什么少壮军官的“擅自”行动呢？

以战谋财，侵华激进主张得到财阀暗中支持

熟读日本历史的人会发现，财团和政界高层的名字很多都是“太郎”“一郎”“龙一”等，这是日本在历史上长期实行“长子继承制”的原因。中国从汉武帝为削弱豪强而实行“推恩令”起，总体上是让儿子们平分家产，于是就有了“富不过三代”即大家族财产到孙辈就会分散之说。日本流行家产由长子代代相传，二战前的4万家大小企业和商户多数都是“百年老店”。明治维新后建立的官僚体系，高层很多是出自财团的代表，往往也带有世袭性。这种体制导致权力和财富世代集中于极少数家族，日本战前的四大财团即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就掌握了国内半数工业生产，它们的态度极大影响了当时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决策。比如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三井等财团马上跟进“开拓”掠夺资源，获得暴利后滋长的扩张野心又让它们赞成继续向华北、华中侵略扩张。

细看战前日本军官的名字，则是常以“次郎”“贤二”“三郎”和“四郎”等多见，这主要是因家中诸子除老大外在成年后需要出去创业。在古代，这些人往往充当下级武士、出家或沦为浪人；到

了近代，考军校升军阶成了一个新的出路，长子当军官者也多出自没多少财产的家庭。战前日军尉官收入不及大学毕业生，如果结婚成家就会颇为困窘，晋级少佐工资会升3倍以上，因而有“贫乏的尉官，富庶的佐官”之说，升将官后更能获得高层富豪级享受。1937年全面侵华开始前，日军总数限制在30万人左右，其中军官定额只有4万多，要想晋升主要靠战功和长官赏识这两条路。不少想升迁的下级校尉因此盼望开战，并且攀附某派长官，为其卖力成为“死党”。

战前日军高层不仅有地域性派系，还在三个主要侵略方向即侵华、攻苏或劫掠南洋的选择上出现不同意见，另外他们同政界也有军费分配之争。对于内部分歧，那些残暴的军头也往往想以暴力解决，因为自己“不便出面”，转而让下属动手。“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国内一再发生刺杀首相、大将和其他重臣的事件，凶手几乎都是尉级军官。比如1932年，一群年轻军官闯入首相犬养毅家对准他的脑袋开枪，原因就是这位老臣反对增加军费。后来，凶手却因一些军政要人称他们是出于“爱国心”而受到特赦。1936年2月26日，当陆军出现“统制派”和“皇道派”的激烈对立时，几位大尉青年军官带领大约1400人在东京兵变，杀死多名有大将军衔的大佬重臣。“二二六”兵变之前，多位“皇道派”将领秘密对叛乱者表示支持，并说他们想袭击的人“该杀”。只是此事引发天皇震怒后被压制，多名尉级军官被处死刑，支持他们的高层人物却未受追究。后来日本当局和一些媒体称这些事是“下克上”，了解内情的人却清楚不过是“上克上”的高层内讧而已。

日本财团对军界内讧表面不予参与，实际上却认为“皇道派”主张北攻苏联捞不到油水，主张侵华的“统制派”得到其暗中支持而

在“二二六”兵变后主导了军部。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5年间，日本国内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财阀获大利的同时下层民众收入也大多有所增加，这就促成了日本社会出现拥护侵略扩张的狂潮，那些对外滋事的少壮军官由此成了受拥戴的“国民英雄”。这种恶性刺激使官、军、财三界一致要求扩大战事，日本侵略战车就由中国东北进一步开向大半个中国，甚至冲到太平洋战场而无法刹住。

东京审判为何留下“历史缺憾”？

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战，加上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吃亏后不久便转入反攻，使日本军方的消耗大大超过掠夺所得，国内财阀不仅发财梦破灭还面临输光老本的局面。1944年下半年起，日本主要财团和代表他们的政客就私下商议要尽快与美国议和，天皇也派“御弟”高松宫在瑞士主持对美密谈。1945年2月，几百年间传承下来的日本头等权贵、战前首相近卫文麿汇集政商意见密奏天皇，说战败已不可避免，想要保存“国体”就须牺牲军界，尤其是让从“满洲事变”起就打先锋的军官们承担责任。

在瑞士的秘密谈判交易中，美方出于尽快结束战争以减少自身损失，同时在战后控制日本以抗衡苏联的考虑，于1945年夏初同意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可以保留天皇制。起初，天皇还想继续讨价还价，但当年8月上旬苏联出兵以及美国原子弹核爆广岛和长崎后，他在御前会议上决定接受美国的条件。当时，日军主要头目大多认为日本还有700万兵力，本土还未被攻入，不愿接受投降，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在御前会议上就叫嚷要死战到底。不过，日本天皇的“圣断”得到政府文官和财团支持，军队没有政界和财力支持就无法再打下去，阿南等军头随即在家中自杀，东京城内闹事拒降的少壮

派军人也只好在广场上向自己头上开枪。此时已经退位多时并在家中闲居的原首相东条英机也对自己的心脏开了枪，却因打偏而被抢救过来，当时的新任陆军大臣下村定还骂他不肯“到法庭上为天皇承担责任”。这段日本军国主义高层内部争执的历史及其结局，也清楚说明了谁才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主要操控者。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美军40多万兵力进驻日本本土，并根据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要求在东京主持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判处7名甲级战犯死刑，其他一些战犯分获无期徒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惩处这些战犯虽然伸张了正义，但审判也留有遗憾，那就是遭受惩处的主要是“光头军阀”，日本皇族因为美国事先的承诺而不被追究（包括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朝香宫鸠彦王），财阀们也安然无事。美国时任副国务卿、原驻日大使格鲁在给白宫的报告中就说：“日本的大企业家在战前和今后都是我们的朋友”。美国在日占领当局当时只解散了三井财团，而且也只是让其分拆成几家公司，其他财团在战后还是名牌企业，并在产业链上依附美国资本并引进新技术实现升级。被日本及其相关企业强征劳工的中韩等国受害者在战后一再要求赔偿，但相关诉求长年难以得到公正回应。

出现这些历史的缺憾，关键症结在于美国在二战后出于自身战略需求，对日本财团采取利用和收编政策，日本天皇制也得以保留，一些在侵略战争期间代表工商利益的政客战后继续当政。比如二战时的工商相、甲级战犯岸信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20世纪50年代还当上了日本首相。这批自身就背负战争罪的人当政并继续操控日本政经界，他们怎么会去彻底清算国家侵略罪行呢？因此，我们回顾历史，在强烈谴责当年侵略者在战场上所犯暴行的同时，还要深

究日本国内的深层原因，并以此为戒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坚定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

作者是军史专家

中国抗战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

林利民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启了历时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浴血奋战，英勇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在全世界率先举起武装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大旗，开辟了以中国战场为中心的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为二战胜利承担了巨大牺牲，更作出了艰苦卓绝的伟大贡献。

中国人民率先举起武装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大旗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波及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反动的法西斯势力在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成功把持政权，走上了对内加强独裁、对外扩大侵略、发动战争摆脱危机的道路。

与一战时主要参战方集中在欧陆腹地不同，二战罪魁的德日意法西斯分踞欧亚大陆两端，不是、也不可能像一战那样，一次性地全面打响一场世界大战。因此它们选择先从较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中间国家”下手，先弱后强、依次发动。这一进程以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三省为起点，随后意大利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德意1936年入侵西班牙、希特勒德国1938年入侵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入侵波兰等，然后才是北欧、西欧（1940年）、苏联（1941年6月）、美国（1941年12月）。经过这一场场遍及亚欧非，分布零散、战略上又相互关联的行动，德日意法西斯在世界各地燃起战火。其中，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是这一连串行动的起点，

而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入侵，则是世界各国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首战。

面对德日意法西斯的步步紧逼，拥有强大实力的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却一次次企图以牺牲“中间国家”绥靖法西斯，导致法西斯的侵略步伐不断加快、侵略范围不断扩大，二战战火也越烧越烈，从亚洲烧向非洲、欧洲，直至全球。

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人民自1931年起展开艰苦卓绝的抗争，在世界范围内率先举起武装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大旗，具有开辟、支撑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全局意义、全球意义，也鼓舞、警示了世界，尤其是美英法等西方大国，要阻挡住法西斯的侵略浪潮和野心，唯有以正义战争反击侵略战争，舍此绝无他途。

中国坚持最久，歼敌数量最多

1931年，面对日本军阀的悍然侵略，虽然中国在经济、科技及军事装备上全面落后，但中国军民不畏强敌，勇敢开展大规模对日反击作战。1931年9月19日，中国军民在长春与日军激战，使日军一天之内伤亡145人。同年11月，中国军民为阻止日军进攻齐齐哈尔和哈尔滨，打死打伤日军千余人。1932年1月，中国军民又在上海顽强抗击，迫使日军三度增兵、“四易主帅”，动用了超过4个师团和大批飞机舰艇，月余时间“死伤累万”，最终不得不接受停战，中止侵占上海的企图。

自中国军民1931年打响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第一枪，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国数亿军民长期坚持抵抗日本侵略不动摇。在东三省，沦陷区军民组织起数十万人的抗日联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作战14年，消灭日军20余万，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支援了全国抗战。在关内，中国军民为支持和鼓舞东北抗联，沿长城线

与日军血战，1933年打响了长城抗战，1936年打响了绥远抗战。1937年7月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后，中国军民又接踵打响平津抗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以及台儿庄战役、平型关战役等，撑起了二战反法西斯侵略的“东方主战场”。

待到1939年欧战爆发时，中国军民已经单独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达8年之久。随后，中国军民与苏美英等盟国协力作战，先后发动了百团大战、长沙保卫战、昆仑关战役等大规模战役，并两次入缅作战直接帮助盟军。在日军战线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国抗日主力军和民众，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男女老少齐上阵，采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等特色战法打击日本侵略军，迫使日本侵略者狼奔豕突、风声鹤唳。

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军民进行大小战斗近20万次，重要战役200多场，军民伤亡超过3500万人，累计歼灭日军150余万，占日军总伤亡的一半以上；战争结束时，日本在中国战区投降人数达128万，占投降日军总人数一半以上。中国的伤亡和损失超过任何一个参战国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

中国14年抗战厥功至伟

中国军民一方面独立承担起坚持二战“东方主战场”的战争使命，给日本法西斯造成巨大损失，同时也因长期坚持对日作战、战绩卓著，有力支撑了反法西斯同盟的战略全局。可以说，对于战局中国厥功至伟。

第一，中国拖住、重创日军主力，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作出了直接贡献。日本法西斯军队表面上是陆海军二元结构，但日本陆军在人员、经费方面所占份额皆超过2/3，牵动着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决策，“陆主海从”一向是日本军阀

决策机制的主要特点。中国14年抗日战争期间，因中国军民持续重创日本陆军，迫使其不得不将大部分主力用于中国战场，并牵制日本海军也投入对华作战。整个二战期间，日本陆军在华投入的兵力平均占其总兵力的2/3左右，高峰期时占比一度达94%。即使在1941年12月初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其陆军51个师团中，仍有35个被拖在中国战场。

第二，中国军民对日本陆军主力的牵制与消耗，让日军在北、南、西三个方向进退维谷，对二战全局产生了深刻的战略性影响。一是迫使日军放弃“北进”。日军原计划北攻苏联，但这一计划的核心是陆军主力的集中使用，如1941年“关特演”计划要求至少25个师团投入对苏作战。而中国战场的持久战早已使日军陷入“战而不能胜”的困境，使日军不得不放弃“北进”。二是推迟并牵制了日军“南进”。不同于日本陆军，日本海军一直主张“南进”对美英作战、占领东南亚。但日本陆军被拖在中国战场、损耗巨大，迫使日军推迟“南进”时间表，直到1941年12月日本海军冒险“南进”时，陆军只能派出11个师团配合作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日军“南进”的战机、速度和成果。三是迫使日军进一步“南进”攻澳、“西进”攻印的计划流产。占领东南亚后，日本海军为巩固太平洋海上优势，企图占领澳大利亚，但这一计划需要出动多达50个师团。类似的还有“西进”计划，1944年日军在缅甸境内发动英帕尔作战，企图配合德国对苏作战、攻入印度。在中国军民的抗击下，日本只能勉强投入10万军队，结果以惨败告终。

第三，中国军民长期坚持抗战并大量消灭日本侵略军，鼓舞了反法西斯同盟、尤其是“中间国家”的反法西斯侵略斗争。面对侵略，中国与大多数“中间国家”相似，都是以农业国抗击工业强国。

但中国共产党人及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依靠人民、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成为“中间国家”反法西斯斗争的榜样。而在抗争中系统创造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游击战理论，不但为被侵略国家以弱敌强提供了理论武器和方法，也大大丰富了世界军事思想库。

总之，中国军民从1931年到1945年的英勇作战，在全世界率先举起了武装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大旗，勇敢承担并完成了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历史使命，也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这场胜利不是哪个国家恩赐的，而是中国人民用巨大的民族牺牲换来的，奠定了战后中国的大国地位，也让中国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者的尊敬。

作者是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反法西斯大同盟为什么能成功

徐 蓝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全球战争。它开辟了遍及全球东西南北中的几大战场：中国战场，北欧西欧战场，大西洋战场，巴尔干、地中海、东非北非战场，苏德战场，太平洋战场等。在这些战场中，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时间最早、作战过程最长、斗争最艰苦的战场。毛泽东同志曾在1945年4月24日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国局部抗战开始，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中国全国全民族抗战，再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经历了整整十四年。

在这14年中，中国人民以坚韧的持久战，抗击着日本陆军的大部分主力，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援着各个战场的抵抗。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同年底，日本已向中国战场（不包括中国东北）派出了16个师团约60万人，占当时日本陆军总数95万人的2/3。到1938年，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已达24个师团100万人以上，国内本土只剩1个师团。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的大部分兵力仍然被束缚在中国战场上，总数达27个师团，如果加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则为40个师团，约占当时师团总数51个师团的78%。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向中国战区（包括台湾和越南北纬16° 线以北地区）投降的日军共128.3万人，这个数目大约相当全部海外日军274.6万人（不包括关东军）的46.7%。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抗战

期间，中国的死伤人数达3500万，死亡人数达2100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死亡30万人以上。按1937年的比价计算，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人民以自己艰苦卓绝的抵抗和巨大的民族牺牲，粉碎了日本要在“3个月内征服中国”的侵略计划，迫使日本陷入“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使其长期难以与德意结成真正的军事同盟，从而延缓了战争的扩大，制止了日军的北进，削弱了日军南进的实力，有效地支援了苏联的抗德战争，有力地鼓舞和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和壮大，并大大有助于美英等国家实施“先欧后亚”的大战略，直至最终打败德国和日本法西斯。

同盟国的领导人们对中国抗战的贡献予以肯定。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指出，不断加强的“中国的壮丽的防御战”是阻止希特勒“征服世界”计划的重要因素之一，并认为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坚决抗击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一度轻视中国抗战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不得不承认：“我必须指出，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也肯定“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斗争，大大地便利了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不仅如此，中国还为联合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并成为在世界东方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中国学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认识发生了三个重要变化：

一是修改了“八年抗战”旧说，而是认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

经历了十四年的伟大战争。

二是与十四年抗战相一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也从传统的1939年9月1日，提前到1931年9月18日，并认为九一八事变和中国开始局部抗战，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三是认为法西斯国家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从局部战争逐渐发展为全球战争的过程。其基本叙事是：在亚洲，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开始局部抗战，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5年埃塞俄比亚抵抗意大利侵略的抗意战争，战火烧到了非洲；1937年日本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进入全国抗战阶段，这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爆发的标志，中华民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开辟了对日本法西斯持久作战的东方主战场；1939年9月，德国以“闪击战”突袭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0年6月，法国败降，英国坚持抵抗；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苏联成为抵抗纳粹德国的主战场；1941年12月，日本偷袭位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挑起太平洋战争，次日，美国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全球规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为核心的世界反法西斯大同盟，是取得二战胜利的领导力量。它在战争期间发表的一系列宪章、宣言、公告，如《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开罗宣言》、《美英苏中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联合国宪章》，直到《波茨坦公告》，勾画出一个通过合作、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合作，以确保战后的世界应当是一个各国主权领土完整的、和平与安全的战后世界。与此同时，这些宪章、宣言和

公告，在国际政治、全球治理方面确立了和平共处原则，尊重领土主权原则，集体安全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和平、民主、发展、合作、共赢原则，非殖民化原则，国际关系民主化原则，以及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形成了国际社会制约和预防世界大战、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多维机制与持续诉求，推动着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类文明也获得了新的进步。而反法西斯大同盟的重要成功经验之一，就在于当人类面临共同的敌人法西斯的时候，能够摒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而结成反法西斯大同盟，并肩战斗，最终战胜了邪恶的法西斯。

作者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第二部分

战后秩序：人类迈向共同未来的制度保障

多边合作是战后安排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沈 逸

202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作为战争胜利的成果之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国际体系与秩序安排，至今仍是当今国际关系的基石与核心框架。回顾过去80年，这套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尽管经历了冷战的曲折，但总体上仍然有效地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爆发，比较成功地避免了大国之间再度直接发生类似二战那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为战后国际社会整体保持长期和平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历史演进的过程看，战后世界秩序的主干部分脱胎于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世界主义”蓝图。同盟国协力打败法西斯轴心国侵略者的基础，是务实有效的“大国合作”。在设计联合国的基本框架时，作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机制安排的前身，即由中、美、苏、英四大国共同承担责任的构想，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种超越传统强权政治窠臼，务实推进多边合作的努力，奠定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坚实基础。

但令人遗憾的是，罗斯福的主张及其相关的战略遗产，并没有在美国国内得到真正的传承与发展。罗斯福逝世后，美国很快重新回到了强权政治的思路上，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多边主义，重新回到集团对峙和阵营对抗的老路上，并最终导致冷战的爆发。两极对峙格局的出现，不仅割裂了世界，而且直接冲击到联合国作用的发挥。虽然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军事摊牌没有发生，但是频繁出现的代理人战争，对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的公然拒绝，以及对国际合作与发展议程的劫持与扭曲，成了冷战

时期的常见现象。这不仅违背战后世界秩序设计的初衷，也给全球广大国家和地区带来长期动荡。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人类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希望。然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及少数西方国家并没有抓住这一契机来推进真正的多边合作，反而过度消费冷战胜利的“红利”，在全球推行单极霸权秩序。冷战后的美国一度以“世界领导者”自居，将自身意志凌驾于国际法和多边机制之上。打着“维护规则”旗号搞“伪多边主义”，在实践中经常通过“小圈子”架空联合国。这种披着多边外衣的霸权行径，实则是企图以单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以自定规则取代战后国际秩序。

在安全领域，冷战后的北约不但没有随华约的解散而瓦解，反而不断东扩，将冷战思维延伸至欧洲以外地区。美国借机在全球范围构筑自己的军事同盟网络，打着“民主”旗号干涉他国内政，多次绕开联合国动武，削弱战后秩序的合法性与公信力。最终的结果是全球安全治理赤字不断扩大，相关国家的国防预算持续提升，实质性地陷入安全困境。在经济领域，美国和西方一度主导了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超级全球化”浪潮，一味追求资本和市场的无障碍流动，却忽视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和各国内部的社会公平。随着全球范围内出现金融危机频发、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世界各国对这种失衡的经济全球化展开了反思，“逆全球化”的声音开始出现。

事实证明，缺乏包容公平的全球化难以持久，由少数国家主导、片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国际秩序不仅不稳定，也无法让大多数国家共享发展红利。面对挑战，个别国家迅速转向具有显著孤立主义特征的对外战略，“退群”、毁约、甩锅卸责，动辄挥舞单边主义政策霸凌工具，扰乱世界正常经贸活动，威胁全球供应

链安全与稳定，令世界面临动荡和不确定。

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愿重回“弱肉强食”的黑暗时代。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加沙危机，都正在持续不断地提醒我们，有必要汲取教训经验，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等过时理念，通过对话谈判化解矛盾，实现共同安全。

在80年后的今天，各国必须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所奠定的国际体系和基本原则。首先，这意味着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联合国体系是二战胜利果实的集中体现，支撑着战后国际公平正义的基本格局。它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支柱，任何试图架空联合国权威、另起炉灶的图谋都必须加以警惕和抵制。

其次，这意味着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强调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由某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说了算。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权参与共同规则的制定与完善。全世界珍爱和平的人民必须牢记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历史，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坚守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最后，要坚决反对新冷战和集团对抗的苗头。当今时代，零和博弈没有出路，搞军事集团对抗只会危及全球安全。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决不允许世界倒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反对分裂对抗，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为人类争取更加光明的未来。同时，近年来的实践证明，拼凑封闭排他的联盟、鼓吹经济脱钩和科技封锁，都是陈旧冷战思维的翻版，不仅不得人心，而且注定无法取得成功。

经历了战争与对抗的人类更加懂得和平与合作的可贵。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为人类迈向共同未来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其积极成果

应当倍加珍惜和维护。展望未来，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回到势力范围划分和冷战对抗的老路，在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下团结合作。唯有如此，才能让《联合国宪章》开篇所期盼的“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理想成为现实，让人类共同的未来更加光明、安全与繁荣。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日本军国主义仍未清除，绝不能姑息

刘晓明

长期以来，西方史书和教科书对于亚洲战场，特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介绍寥寥无几，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巨大牺牲经常被西方所忽视和遗忘。近年来英国知识界和史学界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开始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那一段中英共同的历史，体现了对历史应有的尊重。

在那场战争中，中国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的主要兵力，中国军民为此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的沉重代价，这相当于当时英国总人口的70%。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战略上策应和配合了欧洲战场与亚洲战场的战略行动，制约并打乱了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进行配合的企图。和英国人民一样，中国人民为人类社会最终战胜法西斯反动势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包括英国政府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中英两国军人在远东战场上并肩浴血奋战。英军对日作战伤亡9万多人，其中3.6万人牺牲，仅在日军战俘营中，就有1.2万英军战俘丧生。英国人民成立了各种援华团体，积极宣传中国抗战，通过募捐、义卖、义演等形式筹集援华钱款和物资。对此，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在心。

同时，中国军民在远东战场积极支援、救助英军。1942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转战1500余公里，解救被日军围困的英军，而自身付出了巨大牺牲。同年，中国舟山东极岛渔民冒着生命危险营救沉没的日本“里斯本丸”号上数百名英军战俘，并拿出稀缺的食物和衣物接济他们。在欧洲战场，24名中国海军学员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役，他们不畏艰险，英勇善战，受到丘吉

尔首相的赞扬。

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说过，“没有充分吸取教训是最重要的历史教训。”

在我们缅怀抗日战场的先烈之时，不能忘记法西斯侵略者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给人类文明造成的空前浩劫。牢记历史就是不允许一些势力企图否认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企图篡改二战历史，企图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牢记历史就是敦促日本正确对待侵略历史，避免重蹈覆辙，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我在任中国驻英国大使期间，曾投书英国主流大报《每日电讯报》，将日本军国主义喻为小说《哈利·波特》中的伏地魔。《每日电讯报》打破评论文章长度限制，全文照发，还特意在头版配发引导性评论。我在文中写道：小说《哈利·波特》中伏地魔把自己的灵魂分藏在七个“魂器”中，消灭伏地魔的唯一方法是把七个“魂器”全部摧毁。如果把军国主义比作日本的伏地魔，靖国神社无疑是藏匿这个国家灵魂最黑暗部分的“魂器”。

尽管日本军国主义存在于现实，伏地魔是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但我认为二者有三大相似之处：

一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伏地魔都代表着黑暗和邪恶，罪恶滔天。在《哈利·波特》中，伏地魔是最大魔头，亦被称为“黑魔王”，人们闻之色变，其统治的时代以毁灭为标志。日本军国主义历史上给亚洲各国带来了深重灾难，罪行罄竹难书。

二是两者都阴魂不散，借尸还魂。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受到致命打击，但并未被彻底清算。今天，靖国神社就是军国主义的招魂社，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宣扬错误的历史观；日本政治正在加速右倾化，军国主义有复活之势。伏地魔一度肉身被摧毁，但借助藏匿其

部分灵魂的“魂器”，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三是对两者都不能姑息纵容，需除恶务尽。伏地魔最终被正义力量彻底消灭，魔法世界又实现和平。然而，日本军国主义正在重新成为今天亚洲的不稳定之源、不安全之根。中国需要联合国际社会共同行动，销恶于复萌，弭祸于未形。这是一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正义斗争。

牢记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80年前，中英同为二战胜利国和联合国创始成员国；80年后，中英是全面战略合作的伙伴。我们有责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携手谱写人类和平的新篇章。

作者是中国前驻英国大使

挑战一中原则，就是挑战二战胜利成果

汪曙申

20世纪上半叶，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至的战争，给人类文明带来至深的黑暗。伴随二战结束，国际社会和主要国家进行了深刻反思，共同决定吸取历史教训，创建新的国际规则与秩序，维护人类长久和平与整体利益。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为二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协商成立联合国，共同制定《联合国宪章》，进而为新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奠定基础。

中国是二战的战胜国，收复了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群岛，重新行使对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的全部主权。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具有全面充分、无可辩驳的法理、历史、事实与认同基础，是“台独”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无法撼动的。就此而言，捍卫一中原则也就成了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题中之义。

首先，国际法确认台湾重新纳入中国版图，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二战中后期，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协商讨论战后国际安排，其中就包括制止和惩罚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侵略。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在埃及开罗举行高峰会议并签署《开罗宣言》。这一宣言于当年12月1日对外公布，在对日战争的宗旨中，明确指出要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开罗宣言》是具有重要政治和军事意义的国际法文件，为确立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秩序奠定了基础。1945年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波茨坦公告》明列的条件均具有国际法层面的强制力。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当年9月2日，在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正式的日本受降仪式，日本政府代表在署名签字的《日本投降条款》中明确表示，“承担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

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到日本投降书，形成环环相扣的法律链条，确认了战败的日本必须将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市举行。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重入中国版图，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中国从法律和事实上收复了台湾，全面实施管辖与治理，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与认可，成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

其次，联合国认同和支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一个中国原则成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重要规范。

联合国的成立和发展，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都需接受并予以遵循的。主权原则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石，世界各国主权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是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以后，不存在自行管理国际关系的权利和能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中国内部的政府继承，中国的主权没有分裂，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政治法律地位没有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际上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行使国家主权。1971

年，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进一步否定了“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巩固了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格局。

坚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就需要坚持和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在联合国法律文件、联大决议和专门机构体系当中，台湾明确地被定位为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地区参与联合国活动需要获得中国政府同意。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办公室官方法律意见明确指出，“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独立地位”。当今世界，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不容挑战。任何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行径，不仅挑战中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也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相关行为者势将沦为现状的片面改变者、和平的蓄意破坏者。

再次，世界各国与中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接受和遵循一个中国原则成为普遍共识和基本准则。

作为国家之间的交往活动，外交必须遵循主权平等原则，否则将沦为强权政治的工具，损害国际关系的公正合理性。中国政府与建交国的建交公报，必然阐明建立外交关系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对双方具有严肃的政治规制力和法律约束力。建交公报的核心问题包括一个中国原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政治承认和法律承认。它排除了“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也排除了台湾具有独立地位或者拥有独立权利。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社会得到越来越广泛和有力的支持。183个国家与中国建交，普遍承诺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

来，坚定支持中国统一大业，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承认已成为外交关系前提和国际关系准则，任何国家挑战和违背它，都将损害与中国的关系。赖清德执政以来自称“台独工作者”，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挑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大肆鼓吹“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两岸互不隶属”。这种“台独”挑衅行径暴露出他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贩卖者”“麻烦制造者”，已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和反对。

最后，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决不允许外国势力介入和干涉。

通常来讲，内政是指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一切事务。《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等重要原则，是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石。如果没有主权赋予的与保护国家内政相关的国际法原则，国际关系将倒退为恃强凌弱的丛林状态。中国法律明确规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受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它的真正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不管台湾当局编织何种口实谋求“台独外交”，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现状，也改变不了一个中国原则的历史和法理根基。

说到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中国人来决定。中国大陆主张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通过两岸协商谈判解决分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干涉。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正义斗争。当今任何国家、任何势力和任何人别有用心地炒作“台湾地位未定论”或者替民进党当局

“新两国论”背书，都是蓄意歪曲台湾问题的性质，对抗国际社会一个中国的格局，挑战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新时代以来，祖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础更雄厚、能力更强大，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台湾问题、阻挠中国统一，都是与历史潮流和大势对抗，必将以失败告终。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为什么需要推进国际秩序的良性变革

朱 锋 钱靖轩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凭借其无可比拟的工业、金融与军事优势，主导着战后国际秩序的演变与发展：制定国际规则、提供财政与安全领域的“公共产品”，并在战略需要时通过制度缺口实现战略嵌入，从而实现其制度霸权。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通过纪念二战这段历史，以二战胜利的“初心”来推动国际秩序的良性变革。

制度性霸权为“过度干预”埋下祸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世界工业产出35%-40%，黄金储备超过世界总量一半，海外部署与两洋舰队确保前所未有的军事投射能力。这种“硬实力”被迅速转译为一种“制度化权力”，即通过塑造制度规则与程序性安排，不断自身优势嵌入国际秩序结构中。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机制总体上体现了大国间的权力平衡，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同时在客观上为美国提供了双重制度优势：一方面，否决权确保美国能够阻止任何不利于其利益的国际行动；另一方面，作为联合国总部所在国和最大财政贡献国，在人事和议程设置上拥有显著影响力。这些设计让美国既能够在规则框架内主导议程，又可在必要时以程序技巧降低他国阻滞。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秩序框架，将其经济理念和政策偏好嵌入到全球金融治理框架之中。

然而，真正将美国的制度霸权从多边合作框架转向对抗性体系建构的关键转折点，是乔治·凯南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著名“长电

报”。这份电报认为，苏联的扩张主义并非源于传统的地缘政治考量，而是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内在需求，因此与苏联的合作是不可能的，美国必须采取长期的、耐心的、坚定的遏制政策。美国政策圈迅速将这一分析编织进具体战略：1947年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以及1949年北约的建立，共同构成了美国主导的制度霸权框架。

这种制度霸权模式创造了一种美国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的执行者和仲裁者的“嵌入式领导”的治理模式，也为美国日后的“过度干预”埋下了结构性的种子。

构建战后东亚秩序，美国有多重算计

在东亚，美国出于对地区主导权与全球制衡版图的前瞻性设算，竭力维护并制度化其地区霸权。其战略逻辑的核心，是以日本、朝鲜半岛、台湾为三个互锁的海陆节点，配合西太平洋制海权与第一岛链地理约束，意在压缩社会主义阵营的外溢窗口。

1951年《旧金山和约》刻意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直接参与与签署，这种处理方式有多重算计：一方面避免中苏在主权条款、赔偿、安保安排上的“阻滞”，从程序上加快日本回归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将对华、对苏未决议题保留为美国可运用的地缘杠杆，使日本战略再定位与地区热点（台湾、朝鲜半岛）保持松散耦合，从而增强美国对日本外部安全边界的裁量权。

对日占领初期，美国强调非军事化与民主化，但随着美苏紧张升级，美国把快速经济复苏与社会稳定置于意识形态改造之前。这为保守政治力量资源重聚提供了窗口，分裂的自由党、改进党及中间保守派于1955年合并为自民党，形成 “吉田路线”——优先发展经济并依附美国安全保障。对美国而言，“吉田路线”与美国的地区霸

权目标互补：美国获得一个低武装风险、可提供工业生产与后勤金融功能的稳定支点；日本保守执政联盟则以对美安全依赖换取“发展型国家”路径。

朝鲜战争是美国将一个区域内战转化为“自由阵营对抗共产扩张”叙事节点的关键事件。《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署，将朝鲜战争期间形成的军事合作关系制度化为长期的同盟承诺。与日美安保关系不同，韩美同盟从一开始就带有更强的军事色彩和更高的制度化程度，这种差异源于朝鲜半岛分裂的现实和持续的军事对峙状态，使得韩国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程度远超日本。韩美同盟的制度特征体现了典型的“保护–自主权交换”模式：美国提供核保护伞和常规军事威慑，韩国则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接受美国的显著影响。

台湾在冷战语境中的战略地位被美国重新编码，从原本的解放战争延伸战场，转化为第一岛链中段的“地缘铰链”。美国借朝鲜战争爆发契机派遣第七舰队入台海，将局部内战态势冻结于“未决政治地位”状态；1954年《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与随后离岛危机中的条件性承诺，体现美国的双层威慑结构：既防止台湾方面利用公开号召引发冲突升级，又对中国大陆传递“有限防御边界—不鼓励进攻”的信号平衡，该机制保留了美国在处理两岸局势时的战略机动空间。

“帝国过度扩张”的征兆开始浮现

冷战结束后，美国进入一个大国制衡的“单极窗口”，其自我定位从“平衡者”转向“秩序管理者”。美国同时推进三个相互嵌套的战略取向：一是以北约东扩维持跨大西洋安全架构的中心地位；二是借助所谓“人道、安全”理由发动或主导多场军事干预行动；三是面对中国综合实力与制度塑形能力的上升，从“接触—融入”框架转入“再平衡—竞争—锁定最大战略

竞争对手”的分阶段调整。与此同时，保罗·肯尼迪所揭示“帝国过度扩张”命题的早期征兆开始浮现——全球承诺与军事投送的总成本曲线在上行，而美国相对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势的边际缓冲在减弱。

1999、2004年两次东扩把北约推进到俄罗斯传统缓冲地带，西方叙事中侧重“民主整合”，俄方则将其解释为安全空间被压缩，由此累积“叙事性安全困境”；同时，北约在1999年对科索沃行动中绕开安理会完整授权，开了“联盟合法性部分替代程序合法性”的坏头。“9·11”事件则让北约史上第一次启动集体防御条款支持阿富汗反恐行动。阿富汗战争初期的打击基地组织、推翻塔利班的明确目标迅速向“重建国家、培训军警、扶植制度”转变。2003年美国又以伊拉克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战争。

美国在巴尔干–中东的军事干预，并没有解决持续治理成本以及合法性两大核心问题，反而使国际社会对美国“权力的边界”产生疑虑。由此，单极秩序管理的“意图正当性”与“程序合法性”之间裂隙开始扩大。

与上述干预路径并行的是对华战略心态的系统转变。进入2000年代中后期，两方面的压力促使美国对华政策认知再评估：一是制造业和岗位外流引发国内不满；二是中国军力现代化对美国第一岛链及西太平洋霸权的影响。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在兵力部署、外交参与和多边贸易协定谋求在制度维度塑形；特朗普政府正式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对手，辅以关税、出口管制、供应链“去风险”等工具；拜登政府继续这条竞争主线，同时强调与盟友协调，终形成“把中国视为最大长期竞争对手”的表述。

推动国际秩序向多极化转变

进入2010年代，面对世界多

极化趋势，美国开始调整其霸权战略，从单边主义转向强调与盟友“协同分担”，即通过一组制度相近、能力互补的国家协作来维持既有制度性霸权的核心框架。

2025年，特朗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颁布行政命令，以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建立对等关税制度，这种做法将贸易争端从经济层面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为美国单方面采取强制性措施提供了更大的政策空间。关税的武器化化运用不仅改变了国际贸易的规则基础，更将经济关系政治化，使得经济相互依赖从合作的纽带转化为竞争的工具。美国还通过炒作“经济安全”“经济胁迫”等问题，干扰地区供应链和产业链，推动其他国家参与针对中国的“协同脱钩”。

在亚太地区，美国通过印太战略试图重新定义地区秩序的基本原则，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这种“规则”往往是美国及其盟友制定的，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针对性；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RCEP等多边机制，提出了不同的地区合作模式和治理理念。这种制度竞争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国际秩序愿景：美国坚持的等级制联盟体系与中国倡导的平等制合作网络。

今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回顾80年来国际秩序的演变，不难看出，战后设计的多边合作框架正面临对抗性叙事的威胁。尤其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往往抱持“例外主义”心态，认为自己有权根据自身利益重新解释或选择性适用国际规则。

从科索沃战争绕过安理会授权，到伊拉克战争的“先发制人”逻辑，再到当前对华科技封锁的单边主义做法，都是大国权力滥用与过度干预的例证。更关键的是，这并非巧合，而是有着其内在逻辑与必然性。当一个国家拥有压倒性的

综合实力优势时，它自然会倾向于通过单边行动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多边协商寻求妥协。这种倾向在面对挑战或威胁时会进一步放大，导致霸权国越来越依赖强制性手段而非合作性机制。

若美国无法对自身的权力滥用与过度干预进行有效约束，全球秩序将不可避免向“功能拼接、多节点制衡”的新格局演化。在这种新格局中，美国虽然仍将是重要的一极，但其单极霸权的时代将宣告终结。

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学者

第三部分

面向未来：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需要新理念、新方案

马小军

二战胜利是人类正义的胜利，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本质上是捍卫人类共同的正义与良知。环顾80年历史进程，战后人类文明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与历史经验值得人们认真总结、梳理，其中那些最基本的宗旨、原则，应当得到庄严重申并铭记。这些成就仍是支撑人类今天得以生存在这个星球的坚实地基，这些经验也仍是引领人类文明奔向下一个80年的历史借鉴。

人类和平事业面临严峻考验

一股挑战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的历史逆流涌动。个别国家奉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肆意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践踏《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大国之间地缘政治博弈、对峙加剧，局部冲突和热点交织叠加，全球冲突数量达到二战结束以来新高；俄乌冲突持续超过三年，实现和平仍困难重重，巴以–中东冲突愈演愈烈；以武力改变国家主权边界事件，在冷战结束以来不断发生。

逆全球化潮流愈演愈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展严重滞后，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发展差距。历史虚无主义、历史修正主义沉渣泛起，以错误史观模糊是非标准、挑战正义良知，侵蚀战后国际秩序的根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单边主义、霸凌行径危害深重，世界和平面临现实威胁。

作为战后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主要建构者的美国，在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下，推行“退群”外交，大幅度减少国际

公共产品供给，显示出美国从世界退出的趋势，致使既有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动摇。一个没有美国参与，即所谓“G-1”的世界将会怎样的问题，已引发国际舆论热议。

尽管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来，而应在悉心维护的基础上深入改革完善。80年来，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创建者、建设者、受益者，也是坚定的维护者。在当前各种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面前，中国以坚持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大势的大判断，坚定走多边主义道路，愿与世界各国一道，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中国始终坚持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使其更加公正合理，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国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变，推动多边合作的行动也不会变。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切实推动国际体系改革向好向善。

中国引领推动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超越不同历史文化、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局限，寻求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最大公约数和各国利益多元化的交汇点，以造福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宗旨，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解决世界面临的诸多政治、安全、发展、文明和生态领域的问题与挑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了一种与传统不同的国际关系新方案。相互尊重主权，当然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国家间平等相处的基础。以合作互惠为基

础的双赢是中国外交政策奋斗的目标，这一理念贯穿于中国的外交政策。过去80年中，中国主张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在与国际社会打交道中，学习摸索出了与不同国家相处的经验，尤其是在与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大国外交实践中，更是摸索出了一套新型的大国相处之道。国际社会可以从中国的外交实践中，看到一种可行的新选择方案。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不搞唯我独尊，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坚持与时俱进、不搞固步自封。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张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共同维护，世界上的事要各国商量着办，不能允许谁的“胳膊粗”就听谁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正在积聚越来越多的国际共识，正以制度、机制的形式渗透融入当今国际秩序。

中国正在力所能及地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以可触可及的实际行动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实践。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擘画出世界共同发展、普遍安全、共兴文明的最大同心圆，正在实践中有利有序地推进，赢得广泛的国际赞誉和各国积极参与。

中国力量每增长一分，世界和平希望就增多一分

过去80年，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当今世界上找不到比中国纪录更好的大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或冲突，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当今中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当然期盼保持世界长期和平的大局面，不仅为自身也为全球经济发展，创造稳定、良好、确定和可预期的国际大环境。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参与创建的东亚经济-治理体系、金砖合作机制、上合组织、亚投行等，正在成为全球南方国家集聚的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平台，功效卓著。金砖机制如今已成为全球南方合作的主心骨和南方国家增长的发动机。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八项行动，为全球南方加快发展注入新动力。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将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道，推动实现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面对日新月异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国际秩序早已溢出传统空间和边界，网络、大气层及外太空、海底、虚拟的数据-算力空间等正在成为国际秩序空间的新边疆，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场域。对这些新空间的战略控制，将直接转化为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力、经济杠杆和军事安全优势。大国正通过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以及先进的制造业等加速前行，在涉及敏感层面的高技术前沿领域展开激烈的技术与市场竞争。中国率先推出一系列相应国内规管法规政策，也一再呼吁大国间的合作。大国必须担负起合作制定治理的责任，建构切实有效的国际法制约束体系。战后80年大国在核武器、生化武器管控制度构建方面的经验，仍可借鉴。

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技术鸿沟日益深化、南北两极分化局面正在出现。面对西方高筑的技术壁垒与绿色转型障碍，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存在数字基础设施不足，受到资金短缺与技术转移机制缺失制约，面临沦为高科技与数字鸿沟新殖民地的风险。国际社会正在通过努力及相关合作框架，消弭南北差距及发展的不平衡。全球南方国家希冀看到大国担当、引领全球绿色和数字化的发展。

发展壮大了的中国向世界承

诺，中国强大了也绝不称霸，绝不做超级大国。中国愿同世界上所有国家一道，以史为鉴，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持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为人类前途命运争取更加光明的未来。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以四大全球倡议应对当前国际挑战

李开盛

正确看待历史，是为了更好应对未来。二战是近代以来国际政治影响最大的事件，它不但塑造了当时的世界面貌，还奠定了自那之后的国际秩序。因此，对二战的认知，与如何认识、坚持和发展战后国际秩序密切相关。作为二战胜利国、战后国际秩序中的重要角色和塑造未来世界秩序的建设性力量，中国一直努力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战后国际秩序。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反映了中国对正确二战史观的坚持和对历史前进大势的把握。进一步切实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是维护和发展战后国际秩序的根本性举措。

坚持正确二战史观，是把握历史前进大势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历来善于把握国际大势。传统上，中国一直强调以史为鉴，注意从历史研判现实和把握未来。共产党人坚信，国际形势虽变幻不定，但自有其深层规律。为了把握这一规律，就必须对相关历史有全面且正确的认识。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这一论述全面解决了坚持正确历史观做什么、为什么的问题。

所以，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维护并发展好战后国际秩序。战后国际秩序是建立在二战胜利成果基础之上的，要维护好战后国际秩序，就离不开对二战

的正确认识和经验总结。如果对二战的理解有偏差，在什么是战后国际秩序、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等问题的理解和执行上也就会有偏差。当前，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奠基者之一美国，基于一己之私，越来越走上背弃大国协调、否定经济全球化甚至是否定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邪路，战后国际格局与相关规则面临被全面破坏甚至被颠覆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必要坚持正确二战史观，为维护和发展好战后国际秩序提供更多历史、法理基础和正确的未来方向。

也许战后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现实地看，它仍是我们当前所能实现的相对较好的选择，也是未来更好国际秩序的基础。一方面，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和大国协调等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精髓，当前应该进一步坚持而不是放弃。另一方面，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并不意味着抱残守缺，如何更加有效地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和实现公正，仍然是战后国际秩序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解决的方向绝不是华盛顿搞的“美国优先”和关税战，而是需要世界各国在掌握历史趋势的基础上，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出发，提出对世界各国都有利的方案。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维护和发展战后国际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在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上，对未来国际秩序发展提出的系统方案。从基本目标与原则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战后国际秩序及其规则一脉相承。无论是“五位一体”（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的总布局和总路径，还是“五个世界”（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

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目标，都是二战结束、联合国成立时所期待的“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等普世愿望的具体化。

与此同时，针对战后国际秩序中和平难以维持、发展难以保障、正义难以落实的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试图从以下方面予以更新，对战后国际秩序实践予以扬弃：一是强调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国家体系难以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对本国优先意识甚至是民粹主义现象予以“解毒”；二是强调新型全球化，在致力于解决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同时，探讨新技术背景下的全球合作模式；三是强调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大国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倡导各国共同参与的真正的多边主义，走出一条共同安全与发展的道路；四是强调统筹发展与生态保护，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有人可能以为，在美国霸权掠夺本性全面爆发、地缘政治博弈强势回归之际，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似乎是缘木求鱼、注定会曲高和寡。但国际政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观念建构的产物，特别是大国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引领作用。在美国为一己之私全面拉低国际政治合作与道德水准之际，其他国家应该发挥更大的积极合力，捍卫并发展好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为目标的战后国际秩序，而不是被美国“拉下水”。基于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国际社会应该发出更多类似的声音。

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中国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理念原则，更是实践纲

领。为此，中国先后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从多个维度指明人类社会前进方向，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今年是二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有必要在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的基础上，以四大全球倡议应对当前重大国际挑战，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持久根基。

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当务之急是捍卫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当前全球发展的重点仍然是占世界国家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人均国民总收入约1000美元的最不发达国家。事实证明，有了经济全球化，这些国家不一定能够发展，但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这些国家肯定不能发展。只有继续坚持自由开放的全球化进程，并在这个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公正，在基础设施和发展经验方面提供帮助，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征收霸凌式关税，才能让这些国家有机会进入世界市场、获取更多资金与先进的技术，最终把发展的希望变成现实。

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关键在于坚持共同安全观，重建以大国协调为基础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秩序。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新一轮的中东战事，抑或是印巴、泰柬边界的突发战火，都需要相关各方抛却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考虑彼此的合理安全关切。事实证明，只有在一个多极化而不是一国独霸的框架下，各国合理关切才能得到比较平衡的考虑。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冲突，就必须推动世界各国重新重视和推动多极化进程，特别是大国要抛却同盟对抗和意识形态思维，通过务实协调为冲突的世界提供更多现实解决方案。

要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根本之道是最大程度地求同存异，以尊重、包容的精神推动国家间、文明间的人文交流对话。文明的多样性

是世界的财富，而不是包袱。要促进各个文明包容互鉴，就必须摆脱自以为“山巅之城”、不顾他国国情推广某种模式的西方普世价值的做法，或是视任何差异为“异端”、排斥对话甚至是采取武力手段予以消灭的极端主义思维，以及轻视人文交流作用、把教育科技文化交流作为打压他国的政治化安全化政策，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高度重视、平等对待其他文明，才有可能把文明差异变成促进交流的动力、共同发展的源泉，而不是引发冲突的导火索。

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核心是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在坚持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前，以歪曲二战史观为特征的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扭曲否定和以关税霸凌为表现的霸权主义恶性膨胀相互呼应，对国际治理架构造成了严重冲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面对这一挑战的有力回应，也是实现全球安全、发展和文明倡议的根本保障，成为各国共同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从人类文明高度再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

李忠杰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与世界的交融，中国对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认识和界定也逐渐深化，越来越突出地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来审视和界定当年的那场战争。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着重指出，“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

对抗日战争性质的这些界定，升华到了人类文明的高度，更加深刻地揭示，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一场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反动的大搏斗。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所作所为，都是向人类文明的挑战。这就从根本上指明了法西斯的侵略行为是不可容忍的，而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抵抗则是正义的、进步的。

近代以来，国际社会形成的基本价值观之一，就是承认侵略是非法的。但对什么是“侵略”，一直有不小的争论。1953年和1956年，联合国大会两次设立侵略定义问题特别委员会，研究侵略定义问题。到1974年，联合国大会终于通过《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确认：“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本《定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决议列举了构成侵略的七种行为，并指出，“国家违反宪章的规定而首先使用武力，就构成侵略行为的显见证据”。

这就是人类社会经历长期的磨难和思考之后，超越不同利益和

认知达成的共识，是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发展进步的典型表现，归根结底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共同的认知一旦形成，就成了一种价值标准，既成为一种道德约束，又成为一种国际法准则。

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看问题，就可以超越不同国家的利益、认知和价值取向的差别，以共同的标准确定国际关系中哪些事情是正义的、哪些事情是非正义的，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如果以国际法的形式固化下来，就成为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的道德和法律准则。如果违反这些准则，不仅要受到国际社会的道德谴责，而且会受到国际法的制裁和惩罚。这是文明发展之要求，也是文明规范之约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来之不易，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和深刻的经验教训。80年来，很多国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总结经验教训，国际社会也在不断地反思这场战争，探讨如何防止战争悲剧的重演。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哪些重要的经验教训，国际社会应该从中得到哪些重要的启迪呢？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既要维护本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曾经饱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侵害的伤痛，所以，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对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也决不侵犯其他国家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经过70多年的实践检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渐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发表讲话，都强调要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

第二，任何国家都不能用战争手段解决相互之间的冲突，所有违反这一原则的行为都要受到抵制和惩处。人类对战争的认识过程，本身就是文明发展的过程。历史上，曾经认为战争是获取自身利益的必要手段，甚至是强盛和力量的表现。但到1899年和1907年的两次海牙和平会议，开始对国家的战争权加以限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的国际联盟，进一步限制成员国进行战争的权力。

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等文件，最终确立了不得进行侵略战争、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种战争或武装冲突仍不断发生，这说明，真正执行非战原则、实现人类和平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当代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和组织，都应该促进这一文明的实现。

第三，任何国家都必须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共同维护符合人类文明要求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以联合国组织和联合国宪章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秩序，是吸取两次世界大战惨痛教训的产物。虽然并不完美，但有秩序总比无秩序要好。战后以来，由于和平与正义力量的不断扩展，这样的秩序也在逐步改进和发展，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总体上对世界是有利的。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世界各国都必须严格遵守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基本手段与重要保障，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和标志。凡是自己认可了的国际法，就有责任和义务严格遵守。凡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都要受到抵制和谴责。

第四，每一个国家都要尊重这种多样性，善于与其他文明和平共处、交流互鉴，编织人类文明更

美的图景。如何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始终面对的一个大课题。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每一个国家都应坚持文明多样性的理念，正确对待文明类型的差异和矛盾，以宽阔的胸怀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要共同推动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建立和完善涉及文明问题的各种规则，制定更多的处理国际文明关系的准则和文件，形成文明互鉴的制度和机制。

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最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一个和平、发展、文明、进步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社会曾经多次站在十字路口，多次遇到“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仅100多年来，就至少已经遇到过4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处在十字路口，由于没有能正确回答“向何处去”的问题，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没有能正确回答“向何处去”的问题，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对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于是世界分裂成了两大阵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类第四次站到十字路口，面临“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结果是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

到现在，世界又一次站到了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又一次面临“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在人类再一次面临对抗还是缓和、战争还是和平、侵略还是反侵略的关键时刻，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更要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铭记用千百万人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把

世界的航船引向正确的方向。

正确回答“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制止战争、维护和平，关键是要充分认识到，今日世界已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只有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才能正确认识本国与他国的关系，才能以正确方式处理各种复杂的国家关系，才能真正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才能真正摒弃冷战思维和侵略手段，才能让世界免于重演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给出了理性可行的行动方案。我们期望，通过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和总结，进一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升华。

作者是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结语

捍卫战后胜利成果，共筑人类命运方舟

王 帆

1945年9月，当日本签署投降书的消息传遍世界时，人类历史越过低点，奋力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80年前，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全世界正义力量，同仇敌忾、英勇战斗，并肩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势力，取得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

80年过去，面对俄乌冲突的硝烟再次笼罩欧洲，全球经济遭遇“脱钩断链”的逆流，气候变化导致导致一些岛国或许在不久将会消失等全球议题，世界再次面临新的抉择：要合作还是要对立，要开放还是要封闭？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还是放任强权政治为所欲为？是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还是重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面临失效

二战结束前后，国际社会作出的最重要决定就是成立联合国。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二战胜利成果的集中体现，奠定了

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打造了一个维护世界和平、开展全球治理的最主要平台。《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这庄严宣示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根本宗旨，是避免后世再遭战祸的重要遵循，而以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机制更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保障。

然而，80年后的今天，个别国家大搞本国优先、以所谓自定规则取代战后国际秩序，使联合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实际上，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抬头，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人类需要的是团结而非分裂、对话而非对抗、共赢而非零和。值得高度关注的是，美国所谓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意志和标准强加于人，用自身在盟友小圈子里打造的“家法帮规”取代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则，真实意图就是在现有公认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之外另搞一套美式规则，服务自身霸权利益，导致全球治理面临“碎片化”和“阵营化”的双重挑战，这是当前国际秩序稳定面临的主要威胁。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越要突出联合国的重要地位；挑战越是紧迫，越要维护联合国的应有权威。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世界需要超越旧范式的东方智慧

历史的接力一棒接着一棒向前奔跑，人类进步事业在对时代之问的回答中一程接着一程向前迈进。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重要理念时，恰逢国际体系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关键时期。这一理念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的传承和弘扬，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天下大同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对人类发展方向的独到见解,从根本上回应了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的共同诉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核心要义可概括为三个维度：在价值取向上，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从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各方平等参与、共同协商，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的建立，中国始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在实践探索中，中国积极构建双边和多边命运共同体，为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文明交融共鉴上，从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到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国—中亚峰会等，新时代中国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美美与共搭建更多新的平台，充分证明文明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了广泛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基础上，为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安全领域，中国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各方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构建更加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在发展维度，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共建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让将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有力促进了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工业化进程。在文明交流方面，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以文明交流

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有力驳斥了“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论调。

十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这一理念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丰硕成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全球治理倡议给世界带来的是繁荣稳定的巨大红利，创造的是扎扎实实的民生福祉，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凝心聚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为国际秩序注入新的生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反映了世界人民追求和平、正义、进步的心声，为国际秩序变革注入强劲动力，在一系列务实行动中彰显活力：

在安全领域，中国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从“安全合作”向“综合合作”拓展，建立中国—东盟防务热线，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针对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阿富汗问题等,中国专门发布立场文件,持之以恒劝和促谈,为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上合组织反对针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敌对行为，呼吁世界各国避免对抗。中国与中亚国家持续扩大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亚信会议、亚欧会议、中国——中亚五国会晤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合作，2023年5月，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中国成功举行，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正式成立，共同擘画中国中亚关系新蓝图。

在经济领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后，亚太地区形成世界最大自贸区；截止2025年6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11万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29个城市奔流不息的“钢铁驼队”将来自中国的电子产品、服装鞋帽和日用百货运抵欧洲，也将欧

洲的化工产品、汽车及零部件、奶粉、化妆品等商品带到中国；金砖国家扩容至11国，随着“大金砖合作”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开发银行也将开启高质量发展的第二个“金色十年”，继续成长为国际金融体系中新兴力量和全球南方合作的金字招牌，为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注入更多正能量。这些合作机制构建了开放包容的“朋友圈”，引领全球化从“资本驱动”向“发展导向”转型。

在生态领域，中国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8.4%，超额完成了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到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前6个月，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下降2.7%，创历史新高，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占全球总量的36%。中法两国共同推动《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达成，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在昆明举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内涵不断深化拓展，为不同文明相处提供新范式，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为国际交往提供新观念，为应对共同挑战提供新方案。正给世界带来的是繁荣稳定的巨大红利，创造的是扎扎实实的民生福祉。

秩序的未来，在于“共同”的力量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之所以能带来80年的总体和平，是因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本质上是对这一追求的继承与升华，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处原则。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本质是多边主义，核心是以《联合国宪章》

为基础的多边规则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机制，通过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国际法治权威、提升多边机制效能，这既是弥补治理赤字的应有之义，也是国际社会必须解答的时代课题。

历史已证明，唯有同球共济，凝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才能团结应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和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人类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固守霸权旧梦，只会让世界滑向对抗的深渊；推进命运与共，方能开辟团结合作的新篇章。

作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学院院长

《环球时报》社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026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翻印

环球时报
GLOBAL TIMES